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 学术通讯 ——

2009 年 08 月（总第十二期）

Fudan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in Social Sciences

— 2009. 08 —

E-mail: ias-fudan@fudan.edu.cn

上海市杨浦区邯郸路 220 号复旦大学光华楼东主楼 28 楼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200433)

目 录

一. 重点信息	3
1. 复旦-耶鲁合作创建《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将于9月1日正式开通 ...	3
2. 复旦大学秦绍德书记庆祝《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正式开通的贺信	4
3. 耶鲁大学列文校长庆祝《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正式开通的贺信	5
4. 《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网站主编致辞	6
5. 关于《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	8
二. 学术成果	9
1. 邓正来著《哈耶克法律哲学》、《哈耶克社会理论》出版	9
三. 学术信息	11
1. 前驻法大使吴建民受聘担任复旦高研院名誉教授	11
2. 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潘世伟一行视察高研院	14
3. 复旦大学高研院 08 年度“中国深度研究”学术工作坊一般性项目结项答 辩通知	15
四. 吴冠军博士加盟复旦高研院	16
五. 学术交流	16
1. 邓正来教授、王国斌教授出席“复旦大学近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与成 长国际学术讨论会”	16
2. 邓正来教授出席“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法制现代化”学术研讨会	17
六. 学术会议	18
1. “新新中国，走向世界——中国软实力建设论坛”举行	18
七. 学术讲座	22
1. Fudan-UCLA社会科学暑期高级学术翻译班（第一届）开班	22
2. Fudan-UCLA社会科学暑期高级学术翻译班（第一届）结业	24
八. 媒体报道	26
1. 全球化与中国社会科学的“知识转型”	26

一. 重点信息

1. 复旦-耶鲁合作创建《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将于9月1日正式开通



《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网站（YaleGlobal Online FudanEdition）是复旦大学与耶鲁大学的校级合作项目，由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与耶鲁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具体合作承办的聚焦全球热点和前沿问题的大型综合性深度评论网站。

《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是《耶鲁全球在线》（YaleGlobal Online）面向中国受众的中文网站，也是中国大陆第一家以“全球化”（globalization）为主要议题的中文网站。作为中文网络杂志，《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网站是《耶鲁全球在线》的唯一中文版本，主要由《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编辑部移译《耶鲁全球在线》英文版文章编辑而成，同时又收集、整理了部分中国学者的相关文章。其网站构架参照《耶鲁全球在线》的结构模式，大致分为主题、地区、专题报道、论文、书籍、多媒体等几个板块，并在显著位置标明了焦点文章、最近更新、最近新闻等栏目，综合报道世界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各项学术信息与成果等。

作为耶鲁大学长期的战略合作伙伴，复旦大学在2008年10月与耶鲁大学签署协议共同建设《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网站。经过近一年的认真筹备，《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定于2009年9月1日正式开通。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教授和耶鲁大学校长 Richard C. Levin 教授都为网站开通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贺信。

《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目前编辑部的成员有：主编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邓正来，主编助理为新闻学院教师沈国麟博士和邓建国博士，编辑助理黄星烨和李明。另外，编辑部还经过公开招聘和层层选拔，在全国范围内挑选和招聘了数十位译者。

值此网站开通之际，我们热烈欢迎各方友人和同道前来访问本网站，并提出宝贵的意见。

《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网址：<http://www.yaleglobalfd.fudan.edu.cn/>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编辑部
2009年8月30日

2. 复旦大学秦绍德书记庆祝《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正式开通的贺信



复旦大学

致耶鲁大学校长 Richard C. Levin 的贺信

尊敬的 Levin 校长：

欣闻《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正式开通。我代表复旦大学对此表示热烈祝贺！向您和耶鲁大学一直以来对该项目的关心和支持表示衷心地感谢。从去年 10 月达成共识到网站正式开通，不到一年时间。这其中凝结了 Nayan Chanda 先生、邓正来教授等许多同仁大量的心血。

作为全球化研究领域优秀的学术刊物，《耶鲁全球在线》在世界范围内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复旦版的推出，将在东西方之间架起一座关于全球化研究的交流平台。希望经过双方编辑人员的共同努力，依托两校丰富的学术资源，《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能够成为最前沿的思想聚集、交汇的场所，为推动全球化研究进入中国和中国学术走向世界，为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作出应有的贡献。

复旦和耶鲁的友谊源远流长。近年来，两校交往更是跨入了新的阶段，在学生交流、教师进修、科研项目等方面开展了大量深入而富有成效的合作。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无疑是两校合作的又一里程碑。相信它的开通将进一步加深两校的传统友谊，巩固和发展两校的战略伙伴关系，并结出更为丰硕的成果。

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 秦绍德

2009 年 9 月 1 日

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中国·复旦大学
Fudan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in Social Sciences
Fudan University, China

3.耶鲁大学列文校长庆祝《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正式开通的贺信

YALE UNIVERSITY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105 WALL STREET, PO BOX 208229
NEW HAVEN CT 06520-8229

August 27, 2009

Chancellor Qin Shaode and
President Yang Yuliang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Dear Chancellor Qin and President Yang:

With great pleasure I extend to you and your colleagues my warmest congratulations on the successful launch of YaleGlobal Fudan Edition. The launch of this unique publication not only marks a milestone in the history of electronic publications, but offers a great testament to the blossoming cooperation between Yale University and Fudan University. The launch of YaleGlobal Fudan Edition is cause for special satisfaction to me as it brings to fruition one of my goals in setting up the Yal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Globalization and its flagship publication, YaleGlobal Online magazine nearly eight years ago.

When YaleGlobal Online was launched in 2002, it was charged with exploring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growing interconnectedness of the world by drawing on the rich intellectual resources of the Yale University community, scholars from other universities, and public- and private-sector experts from around the world." Since its modest launch, the online magazine, under the editorship of Nayan Chanda, former editor of the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has steadily grown, reaching millions of readers all over the world, and its articles have been translated into many languages. Now with the publication of YaleGlobal Fudan Edition and YaleGlobal in Chinese, to be hosted at Yale, original YaleGlobal articles will be available every week to a vast number of readers in and outside China, thus realizing our global mission.

I wish YaleGlobal Fudan Edition brilliant success in its mission, and welcome it as another example of the blossoming of relations between our two great institutions.

Sincerely yours,



Richard C. Levin

RCL:mg

附 译文

耶鲁大学

校长办公室

105 WALL STREET, PO BOX 208229

NEW HAVEN, CT 06520-8229

2009年8月27日

致上海复旦大学秦绍德书记、杨玉良校长

尊敬的秦书记、杨校长：

值此《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网站成功开通之际，我谨向你们以及你们的同事致以最热烈的祝贺！这份独特的网络出版物的开通，不仅是电子出版物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而且也是耶鲁大学与复旦大学合作欣欣向荣的一个伟大明证。我对《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的开通深感欣慰，因为它实现了我在近八年前创立耶鲁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及其旗舰出版物——《耶鲁全球在线》杂志——的诸目标之一。

《耶鲁全球在线》于2002年开通之时，肩负着这样一项使命：“依托耶鲁大学共同体、其他大学学者以及全球范围内公务部门与私务部门专家的丰富知识资源，探究世界日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意义”。自它低调开通以来，这份网络杂志在前《远东经济评论》编辑——钱安达（Nayan Chanda）——的主编下稳步发展，遍布世界的读者已达数百万，其文章也被翻译成多种语言。现在，随着《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网站以及将由耶鲁主办的《耶鲁全球在线》中文版栏目的开通，中国内外规模庞大的读者每周都将看到源自《耶鲁全球在线》的文章，进而实现我们的全球使命。

我祝愿《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卓越地实现其使命，并乐于将其视为我们两个伟大校友友谊蒸蒸日上的又一范例。

您诚挚的，
理查德·C·列文

4. 《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网站主编致辞

诸位同道和读者朋友：

作为耶鲁大学与复旦大学之间的校级学术合作项目，由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和耶鲁全球化研究中心合作创办，聚焦于全球化及相关问题的大型综合性深度评论网站——《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

（<http://www.yaleglobalfd.fudan.edu.cn/>）——定于2009年9月1日正式开通。

我们知道，最能把握我们当下所处时代之性质的话语当属“全球化”。根据我的理解，全球化不仅是“经济主义”论者所主张的经济全球化过程，而毋宁是一个既依凭民族国家又脱离民族国家的社会变迁过程；全球化亦不是一种同质化的进程，而毋宁是一个单一化与多样化、国际化与本土化、一体化与碎裂化、集中化与分散化相统一的进程；全球化更不是一个客观必然的进程，而毋宁是“全球主义”对其型塑后的产物，是我们根据何种视角去影响全球化进程的“话语争夺权”

问题。质言之，全球化就其性质而言其实开放的，是可以根据中国的文化政治需求和国家利益予以型构的。

我一直认为，根据中国的立场建构属于我们自己的“全球化话语”并使之走向世界、参与话语权的争夺是全球化时代所赋予中国社会科学的时代使命。这在根本上乃是因为社会科学知识是一种以权力和“正当性赋予”为基本实质的话语。社会科学知识绝不像客观实证主义者所宣称的那样只是反映性和描述性的，也不只是技术管制性的，而更是建构性和固化性的——这些知识通过各种制度化安排而渗透和嵌入到各种管制技术和人的身体之中，并成为我们形塑和建构社会秩序及其制度的当然“理想图景”。这在根本上意味着：只要我们洞见到社会科学知识所具有的这种“正当性赋予”力量并恢复其批判性品格，我们同样可以以中国社会秩序的正当性为基点、以中国的国家利益和文化政治需求为根据建构一种新型的全球化话语。

显而易见，我们要基于中国立场提出我们自己的“全球化话语”，一个前提就是首先要对全球化进程的上述性质以及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所提出的各种“全球化话语”有所了解。然而，只要看看中国社会科学界关于全球化问题的研究，我们就不难发现：无论是我们对全球化性质的学理探究，对西方“全球化话语”的理论认知，还是我们基于中国立场对“全球化话语”的理论建构，都几乎付之阙如。

正是处于上述问题意识，我们和耶鲁全球化研究中心合作，在遵循中国法律的前提下，基于中国的实践需要，有选择地将其旗舰在线杂志《耶鲁全球在线》上的相关文章系统移译成中文，并以此形成《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网站的主体；同时，为了使基于中国立场的“全球化话语”真正走向世界，我们除了会收录中国学者的相关论说外，也将利用《耶鲁全球在线》的全球化网络将中国论者的相关代表性论说译成英文向《耶鲁全球在线》网站推介。

《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是《耶鲁全球在线》（YaleGlobal Onlin）的惟一中文版本，亦是中国大陆第一家以“全球化”为主题的中文学术网站。作为主编，我对她寄予了殷殷期望。

我希望：

她既能成为中文在线学术杂志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亦能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全球化”专题学术网站；

她既能成为我们将世界全球化及其相关话语“引进来”的一个信息渠道，亦能成为推动基于中国立场的“全球化话语”“走出去”的一个学术平台；

她既能成为中国学人进行全球化问题理论建构的最大灵感之源，亦能成为中国社会各界了解全球化及其相关问题的最大信息之源！

《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主编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



2009年9月1日

5.关于《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

主办单位：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耶鲁全球化研究中心

主编：

邓正来（复旦大学特聘教授、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

主编助理：

沈国麟（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讲师）、邓建国（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讲师）

编辑助理：

黄星烨、李明

《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每周推出三篇原创性文章，讨论有关全球化的热点问题。参照“耶鲁全球在线”的结构模式，我们将所有的文章按主题和地区进行了分门别类的整理。目前，共设有涉及7个地区（亚太、南亚、非洲、美洲、中亚、欧洲和中东等）的11个主题（经济、政治、健康、性别、环境、全球化、劳工、贸易、科学与技术、安全与反恐、社会与文化等）。此外，在“最近新闻”栏目中还有世界、中国各大媒体有关全球化文章的链接；网站还设有专题报道、

论文、书籍和多媒体等栏目，并特别收录了讨论中国论者有关“全球化话语”的论文和书评。

“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考虑到了现代人的阅读口味，其文章聚焦时事、服务中国，短小精悍、鞭辟入里，特别适合大学老师、学术研究人员、党政机关领导、国家公务员、研究生等各个群体阅读。

另：我们常年征求关于全球化及其相关论题的中英文稿件（英文稿限 1200 字以内）；同时，也常年招聘英译中译者。请将相关材料（译者需提交个人简历和翻译作品）发至：ygofe@fudan.edu.cn

二. 学术成果

1. 邓正来著《哈耶克法律哲学》、《哈耶克社会理论》出版

(1) 《哈耶克法律哲学》

邓正来 著

2009 年 8 月第一版

复旦大学出版社

目录

“闭关”中的思考和幸福 《哈耶克法律哲学》代序
法律与立法的二元观——《哈耶克法律理论的研究》

- 一、 引论：参照架构的设定与论述框架
- 二、 哈耶克建构法律理论的内在理路
- 三、 哈耶克对“社会秩序规则一元观”的批评
- 四、 哈耶克对“社会秩序规则二元观”的建构
- 五、 结语：哈耶克法律观点的启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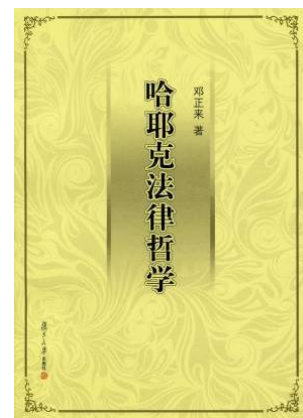
普通法法治国的建构 哈耶克法律理论的再研究

- 一、 引论：问题的提出与分析路径的确立
- 二、 哈耶克对法律实证主义的批评
- 三、 哈耶克法治国的建构理路
- 四、 结语：值得注意的两类问题

普通法法治国的建构过程 哈耶克法律理论研究的补论

- 一、 引论：本文的主旨与论述安排
- 二、 哈耶克法治理论建构过程中的转换
- 三、 哈耶克法治理论中的一般性原则问题
- 四、 哈耶克法治理论进行转换的缘由
- 五、 结语

哈耶克关于自由的研究



- 一、 哈耶克的“终身问题”和时代诊断
- 二、 无知、自由与秩序：哈耶克的“答案”
- 三、 哈耶克自由理论的可能启示

附录

关于哈耶克自由主义思想的答问录

《自由秩序原理》抑或《自由的宪章》

哈耶克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书名辨

哈耶克论法治/迪雅兹(Gottfried Dietze)著

(2) 《哈耶克社会理论》

邓正来 著

2009年8月第一版

复旦大学出版社

目录

哈耶克批判的前提性准备——《哈耶克社会理论》代序

致谢

哈耶克社会理论的研究——《自由秩序原理》代译序

引言

一、哈耶克的社会理论：社会秩序分类学及其知识论基础

二、哈耶克的社会理论：规则系统与行动结构

三、哈耶克的社会理论：对当代自由主义的挑战和对“社群主义”的回应

结论：哈耶克自由主义的哲学困境

知与无知的知识观——哈耶克社会理论的再研究

引论：过程分析与“核心概念”的路径

一、引论：“知”意义上的分立知识观

二、默会知识与实践的意义

三、无知观与社会理论的确立

哈耶克方法论个人主义的研究——《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代译序

一、引论：问题的提出与论述步骤

二、方法论个人主义及其遭遇的批判

三、哈耶克的方法论个人主义

四、结语：哈耶克真个人主义的意义及其遗存的问题

“社会正义”的拟人化谬误及其危害——哈耶克正义理论的研究

引论：论题的设定与论述框架

一、社会正义的基本诉求

二、哈耶克对“社会正义”的批判（一）

三、哈耶克对“社会正义”的批判（二）



四、哈耶克批判“社会正义”之观点的补论

五、结语：哈耶克的“否定性正义观”

附录

关于哈耶克理论脉络的若干评注——《哈耶克论文集》编译序

哈耶克与他的世纪——《哈耶克论哈耶克》导论/Stephen Kresge 著 邓正来译

参考文献/邓正来 编

哈耶克主要英文著作及中译本

关于哈耶克思想的主要研究性参考文献

三. 学术信息

1. 前驻法大使吴建民受聘担任复旦高研院名誉教授

2009年8月14日上午，前驻法大使、外交学院原院长、著名外交家吴建民先生受聘担任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名誉教授，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邓正来教授为其颁发了名誉教授证书。受聘仪式在复旦大学光华楼东主楼102报告厅举行，上海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书记、复旦大学校长助理桑玉成教授主持了仪式。



桑玉成教授代表复旦大学表达了对吴建民大使的诚挚欢迎，感谢吴大使对复旦大学人才培养和学术发展方面的大力支持，并一一介绍了到场的诸位嘉宾：复旦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萧思健教授，上海国际金融学院院长陆红军教授，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庄礼伟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于建嵘教授，《南风窗》杂志社社长陈中等。此外，包括新加坡联合早报、日本朝日新闻、《第一财经日报》、《东方早报》、《新闻晨报》、《中国日报》、《解放日报》、《新民周刊》等国内外的多家媒体的记者也出席了聘任仪式。



邓正来教授做了简短的发言。他代表高研院向吴大使致谢，并特别感谢吴建民大使担任高研院名誉教授一职以及他对高研院学术视野的认可与支持。

吴建民大使发表了热情洋溢的受聘感言，他十分高兴能成为复旦高研院的首位名誉教授，希望高研院能通过对学术问题的深入研究回应时代和社会的挑战，并从事事件参与者和旁观者的角度谈到了对当前社会问题、特别是学界问题的一些看法。

受聘仪式结束后，吴大使接着参加了此次由南风窗杂志社、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和上海笑笑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共同举办的“新新中国——中国软实力建



设论坛”，并做了题为“中国渐进融入世界”的主题演讲。

此前，邓正来教授还在光华楼东辅楼贵宾厅亲切会见了吴大使，并向他介绍了高研院的学术定位、学术理念与学术研究情况。双方还就当今中国社会发展和公民社会建设等问题交换了看法。

附录一：吴建民大使简介

吴建民，现任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外交学院教授，中国外交部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欧洲科学院院士、副院长，国际展览局名誉主席等职。

吴建民出生于1939年，1959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1959年到1971年曾为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国家领导人担任过法语翻译。1971年，他成为中国驻联合国第一批代表团工作人员。在他四十多年的外交生涯中，历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中国驻比利时使馆、驻欧共体使团政务参赞，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及发言人，中国驻荷兰大使、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常驻代表、大使，中国驻法国大使，中国外交学院院长，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常务副会长，全国政协外委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兼新闻发言人等职。他曾于2003-2007年任国际展览局主席，是担任这一职位的第一位亚洲人。

2003年荣获希拉克总统授予的荣誉勋级大将军勋章。

吴建民先生在外交战线上工作多年，学识渊博，温文尔雅，素质修养极高，尤其善于沟通交流。他坚持不懈地利用一切机会和方法，以外国人能够接受和理解的方式，把中国这个千年文明古国推荐给国外，为中国的外交事业和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吴建民先生著有《外交与国际关系——吴建民的看法与思考》、《交流学十四讲》、《在法国的外交生涯》等。

附录二：吴建民大使受聘感言

各位来宾、复旦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

大家好。非常感谢桑玉成教授的介绍，很高兴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聘请我担任名誉教授。因为现在，中国和世界正处在一个思考的年代，一个百家争鸣的局面正在形成，事实上，中国和世界发展的方向已经指明，但这个发展过程当中，特别是中国，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我们还没有现成的解决方案。

刚才在会客厅里，我们大家讨论了很多问题，比如说公民社会，这个概念在世界上于冷战之后讨论得越来越多，在中国，特别是在5.12大地震之后，同样受到广泛关注。

我在观察和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常常反复问自己，这是社会进步的产物还是社会倒退的产物？总的来说，现在倾向于认为它是一个社会进步的产物。举两个例子：其一，北京成立了一个绿色公司，今年在地球日（4月22日）开办了中国绿色公司年会，这就是中国公民社会在发展的例证。这个绿色企业的年会由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主动开办。民营企业已经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意识到地球面临的严峻挑战，主动倡议搞一个绿色公司，全世界都很重视这个东西。其二，前不久我出席了世界能源论坛，它也是来自公民社会，它的模式很有意思，即民办官助，老百姓提出来的建议，政府给予具体的支持，这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可是，人们对公民社会的理解不大一样，在 5.12 大地震之后人们对它的理解在逐步加深，一些正面的提法多了。刚开始，作为中国外交战线上的工作人员，我常听到一些国内的同志说，这是西方的概念，中国人讲西方的概念就似乎有一点消极的成分，有一点贬义在里面，实际上人们在渐渐认识它。中国是政府为主导的，但是民间声音的重要性在上升，例如去年奥运会火炬传递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然后爱国网民的反映，引起了世界的重视，对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的行为产生了影响，有利于奥运会后来顺利地进行。

世界在一个十字路口，一定程度上中国也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到底怎么做，大家在思考，在这个思考的过程当中，复旦大学创办了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进行这方面的思索，研究这方面的问题，对于社会的发展，这是一件好事情，所以我愿意来。

第二，我对复旦是很有感情的，我的朋友陈建是复旦毕业的，70 年代我们在联合国合作很好，通过他我了解了很多复旦的信息。外交部复旦的学生不少，从学生的质量感觉复旦是一个名校，一个很好的学校，我是 97 年第一次跟复旦接触，当时我在日内瓦当大使，政府突然一纸调令把我调到北京，让我给学生们讲人权，到复旦大学来，这里学生们的表现使我很感动，因为当时是礼堂挤得满满的，大概有一千多人吧，有七八十个学生站着听我讲过，我讲了三个多小时，学生们，大都是独生子女，他们站着听你讲话，说明他们有一种求知的欲望，他们对问题有思考有兴趣。

另外，我通过我的好朋友上海社科院院长王荣华教授也对复旦有了更多的解。复旦培养了很多人才，为什么能培养这么多人才？跟这个学校的校园文化有很大的关系，一种校园文化就是一方沃土。复旦，有一定的独立思考与学术自由，所以这里的思想比较活跃。今天，在世界和中国均在大变化的情况下，复旦这方沃土，是不是会孕育出来一些好的思想，这些思想是不是对社会的发展将有触动，我对它有信心，不过这要靠后来的历史发展来证明。以上是另一个方面的原因。

前些年我到小平同志的故里广安去了一趟，因为我是在法国当大使，我就去了解邓小平什么时候去法国的，一了解，他是 1920 年 10 月 19 号去法国，1926 年 1 月 7 号离开的，去的时候 16 岁，走的时候 21 岁，小平同志的这段经历很重要，对后来小平同志提出改革开放有帮助。到小平同志的故里去一考察，我发现邓小平是一位独立思考的领导人。事实上，如果没有一点独立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会出现么？如果都选择盲从，都拜倒在权威面前，中国会有今天这样好的面貌？

第三，上海一直是一个出思想的地方，共产党在这里诞生，很多大家也在上海。最典型的是浦东，浦东创建初期的气势至今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94 年我在出去当大使之前要了解一下国内的情况，当时我作为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到了上海，浦东新区筹委会主任赵启正带了一批人来见我，跟我座谈，他们向全世界的大城市提出了三个问题：首先，你们的城市在建设过程当中，有什么成功的经验？其次，你们的城市在建设过程当中，有什么失败的教训？再次，二十一世纪中，城市建设应该怎么办？这三个问题，出得多好啊！你感觉他们的思想非常开放，走在时代发展的前列。所以浦东发展不是偶然的，你到这个地方去了之后，你感觉耳目一新。后来我到法国当大使，跟法国人说，法国人都听愣了，说能提出这三个问题，那说明他们的胆识不简单。

上海历来有两种文化：一种是海派文化，一种是小市民文化。两种文化都在起作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有很多问题诸如上海的名牌和本土龙头企业似乎越来越少等等都值得我们思考，所以我愿意到这里来。上海有个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原来主席是汪道涵同志，汪老是我十分敬重的老同志，他是杰出知识分子的代表，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他的思想都很了不起，我非常敬佩他，后来汪老走了之后，他们想让我来牵头，我也很愿意来，这就使得我到上海的机会多了。

总而言之，很高兴接受你们的邀请，我非常愿意和大家一起讨论问题，谢谢！

2.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潘世伟一行视察高研院

2009年8月28日下午，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潘世伟教授来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称“高研院”）调研，对高研院学术工作的进一步开展进行了细致的指导。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邓正来教授代表高研院对潘部长一行表示了热烈的欢迎，接着从创院背景、学术定位与学术理念、远景规划、组织结构、工作进展、工作计划等七个方面汇报了高研院的发展概况。邓教授说，与其他类似机构相比，复旦高研院的特色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一个目标”：走向世界；“两个基点”：根据中国、跨学科研究；“三个方向”：以我们对全球化时代世界秩序的理论建构走向世界，以我们对当下中国的跨学科深度研究走向世界，推动中国优秀的哲学文化传统走向世界；“四大举措”：国际化的学术团队，国际化的学术成果，国际化的学术讲坛，国际化的学术会议。

在汇报的最后，邓教授对复旦各院系、社会各界近一年来对高研院的支持表示了特别的感谢：“我必须由衷感谢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社联、复旦大学各位领导和各个部门、各个院系一年来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帮助！我深知：没有诸位同道的帮助，复旦高研院能取得目前的一点点成绩，是完全不可想象的！”邓教授最后强调：“高研院的事业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复旦大学，属于上海，更属于中国！我们是在走一条前无古人的路，是在创建一个独特的符合知识生产规律、立足于中国实践的知识生产平台，是在推进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走向世界！但是，‘宏大目标，点滴努力。’我们必须共同努力，平实持恒地推进我们的事业！”



潘部长对高研院这一年来的工作表示了肯定，希望高研院能够秉承自己“根据中国、走向世界”的学术定位，在学术旨趣上兼具“全球视野与本土情节”。潘部长还着重对高研院的下一步学术工作提出了四点希望：第一，希望高研院更科学的发展，更好地融入



复旦和上海的学术生态环境；第二，希望高研院尽快完成学术聚焦工作，形成自己的核心学术产品；第三，希望高研院在自己核心学术研究方向上有突破性的进展，形成自己的核心学术竞争力；第四，希望高研院能够勇于创新，探索并形成一套有别于一般学术建制、符合知识生产规律的学术机制和办院模式。

陪同潘部长一同来高研院调研的有：上海市委宣传部理论处处长刘世军博士、上海市委宣传部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主任莫建备研究员、副主任荣跃明研究员。复旦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萧思健教授、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处长杨志刚教授也一起陪同潘部长调研，对高研院的未来发展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副院长郭苏建教授，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长江学者、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纳日碧力戈教授，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刘清平教授、陈润华博士、吴冠军博士、孙国东博士、林曦博士，高研院学术联络中心沈映涵副主任、陈晔助理、黄倩助理、张东平秘书等高研院在职全体人员出席了这次汇报活动。

在听取邓正来教授汇报工作之前，潘世伟部长和其他领导还认真参观了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的学术成果，并与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就如何加强学术研究对社会实践的指导作用、如何繁荣上海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如何促进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走向世界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3. 复旦大学高研院 08 年度“中国深度研究”学术工作坊一般性项目结项答辩通知

各项目组负责人：

按照《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学术工作坊项目管理和实施办法》规定，本着学术平等和宁缺毋滥的原则，2008 年度“中国深度研究”学术工作坊一般性项目经过申报、评审、立项、中期检查等一系列工作，现进入结项阶段。

该项目结业答辩时间定于 2009 年 9 月 12 日下午 15:00-18:00，地点为复旦大学光华楼东主楼 2801 室高研院“通业大讲堂”。

另将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1) 每个课题组出一名代表（原则上为项目负责人）来高研院进行结项答辩；

(2) 成果鉴定和结项材料递交请参考《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学术工作坊项目管理和实施办法》；

(3) 本次结项答辩的交通和食宿费用从项目经费中支出；

请答辩项目组成员接到本通知后即刻与高研院取得联系，以确定参加及相关具体信息。

联系人：沈老师

联系电话：021-55665553

附录：高研院 2008 年度“中国深度研究”学术工作坊项目结业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项目负责人及单位	课题名称	成员及单位
周怡（复旦大学）	温州地方制度——权力、关系与利益	王平、李沛（复旦大学）
王庆明（沈阳师范大学）	底层记忆与单位依赖——中国第一家破产国企下岗工人的生命历程研究	王建民（中央财经大学） 王旭辉（北京大学）
刘春荣（复旦大学）	争议政治的行为谱系——来自中国城市底层的经验研究	陈周旺、桂勇（复旦大学）
何慧丽（中国农业大学）	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县乡关系与乡村治理	赵晓峰（华中科技大学） 巍程林（河南大学）
贺东航（华中师范大学）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背景下的失山林农抗争与维权研究——以闽赣两省为例	朱冬亮（厦门大学） 申恒胜（中国社科院）

四. 吴冠军博士加盟复旦高研院



吴冠军博士即将以专职研究人员的身份加盟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吴冠军，哲学学者，1976年10月生于上海，祖籍江苏吴县，1995-1999年就学于上海华东理工大学，2003年至今为澳大利亚墨纳什大学博士候选人，拟任为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专职研究人员、讲师，并任墨纳什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个人学术著作有《多元的现代性：

从“9·11”灾难到汪晖“中国的现代性”论说》（上海三联书店，2002）、《日常现实的变态核心：后“9·11”时代的意识形态批判》（新星出版社，2006）、《爱与死的幽灵学：意识形态批判六论》（吉林出版集团，2008）等，译作有当代意大利政治哲学家阿甘本的《神圣人》（即出）等。

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哲学、精神分析与中国古典思想。2005年作为中国哲学家，接受澳大利亚最大的主流媒体之一SBS的人物专访。2008年著作《爱与死的幽灵学》荣获“第二届双年度后天学术奖”。2009年在《南风窗》杂志开设思想专栏“日常现实的哲学分析”。

五. 学术交流

1. 邓正来教授、王国斌教授出席“复旦大学近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与成长国际学术讨论会”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邓正来教授和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亚洲研究中心主任王国斌教授于8月16-17日出席了在浙江省长兴县举行的复旦大学近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与成长国际学术讨论会。

这场涉及近现代市场经济理论之发展过程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是由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主办的，整个讨论会的主题和内容不仅涉及近现代市场经济的形成和成

长，而且也涉及东西方针对近现代市场经济的历史经验的比较研究，会议于8月16日下午正式开始，全会历时2天，共有150余位来自国内外的知名学者参加会议。

王国斌教授在上午8月16日下午的第一场讨论中进行了主题演讲，题目为《经济史与发展经济学：谁的历史，谁的发展？》。在讲演中，王国斌教授主要讨论并评析了地理和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制度经济学对经济发展的分析、经济史在制度经济学的角色、经济史给发展经济的启发、经济学分析经济发展的困难、政治制度的差别以及经济历史对当代经济发展的可能性等诸多重要问题。王国斌教授的讲演引起了与会学者专家的广泛兴趣，大家进一步就诸多关涉经济学发展的核心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讨。

邓正来教授作为受邀嘉宾主持了8月16日下午第二场的讨论，会议第二场讨论的主题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叶世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赵德馨等5位教授进行各自的主题演讲以后，邓正来教授对诸位演讲嘉宾的发言进行了深刻而精彩的总结和评析。

大会期间，邓正来教授和王国斌教授还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韦森教授、美国三一学院的文贯中教授、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的李丹研究员、美国波士顿大学 Robert A. Margo 教授等诸多嘉宾，就本次国际学术讨论会的主题以及相关问题进行了持久而深入的讨论。

2. 邓正来教授出席“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法制现代化”学术研讨会

2009年8月22日至23日，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邓正来教授应邀出席了由南京师范大学法制现代化研究中心与《法学研究》杂志社联合举办的“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法制现代化”学术研讨会。



此次学术研讨会共有“新中国法律发展六十年”、“全球化与中国法治理论变革”、“全球化与中国法律制度变革”三个单元，邀请了全国近30所高校的60多名法学学者参加。研讨会旨在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深入探讨当代中国法学理论与法制建设领域发生的革命性变化，着力考察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演进趋势，进而系统地总结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的历史经验，以推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时代进程。

邓正来教授在8月22日上午“全球化与中国法治理论变革”这一单元做了主题发言，主要论述了全球化时代背景、法学研究中的侧重点与知识走向世界、未来世界秩序重构等三个方面的问题。邓教授发言结束后，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夏锦文教授和苏州大学法学院常务副院长胡玉鸿教授做了精彩的点评。在场的其他学者对邓教授的发言十分感兴趣，结合自己的研究提出了许多相关的理论问题，邓教授一一做了认真的回答。



8月23日的闭幕式上，邓正来教授作为发言人特别感谢了主办方为这次学术研讨会的成功举行做出的努力，回顾了两天来学者们所提及的一系列深刻而复杂的学术问题，并相信本次学术研讨会将在我国法制现代化进程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会议期间，邓正来教授还和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公丕祥教授、著名法学家孙国华教授、吕世伦教授以及多位参会的知名学者就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法制现代化这一主题进行了细致而深入的讨论。

六. 学术会议

1.“新新中国，走向世界——中国软实力建设论坛”举行

2009年8月14日，由南风窗杂志社、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上海笑笑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共同举办的“新新中国，走向世界——中国软实力建设论坛”在复旦大学光华楼东主楼102报告厅举行。



本次论坛共有开幕式、上午主题演讲、下午主题演讲、圆桌会谈四个部分，分别邀请了前驻法大使、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先生，上海社会科学联副书记、复旦大学校长助理桑玉成先生，复旦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萧思健先生，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邓正来先生，上海国际金融学院院长陆红军先生，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教授庄礼伟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于建嵘先生，《南风窗》杂志社社长陈中先生，《南风窗》杂志社采编中心副主任赵灵敏女士以及上海笑笑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杨晓女士等嘉宾出席。

国内多家媒体包括《第一财经日报》、《东方早报》、《新闻晨报》、《中国日报》、《解放日报》、《新民周刊》、《上海日报》、凤凰卫视、东方卫视、新浪网、搜狐网、网易、大洋网，以及新加坡联合早报、日本朝日新闻的记者和独立撰稿人也参加了这次论坛。此外，虽然时值假期，到场听众们中还有许多来自上海各个高校的老师 and 学生们，会场秩序井井有条。



上午的开幕式和主题演讲由上海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书记、复旦大学校长助理桑玉成教授主持，桑教授向大家介绍了到场的各位嘉宾，并特别对吴建民大使对复旦大学人才培养以及学术发展特别是本次论坛的大力支持表示了感谢。同时，桑教授代表复旦大学表达了对各位嘉宾的诚挚欢迎，详细介绍了复旦大学在中国软实力建设中所做

的贡献，并预祝“新新中国，走向世界——中国软实力建设论坛”圆满成功！

接着，邓正来教授代表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致辞，向到场的诸位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并向吴建民大使颁发了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名誉教授证书。

吴建民大使做了热情洋溢的发言，他十分高兴成为复旦高研院的首位名誉教授，并谈及



对当前社会问题特别是学界问题的看法。首先，吴大使谈及市民社会，指出世界和中国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亦处在一个思考的年代，他看到高研院正在研究这方面的问题，称赞这是好的做法；其次，他谈到自己对复旦这所名校的印象，提到这里有一定的学术自由和独立思考，校园文化丰富多彩，学生们思想较为活跃，复旦为国家特别是外交部培养了很多优秀的人才；再次，吴大使说起自己对上海的感受，在这个海派文化和小市民文化共同起作用的地方，如今有很多值得深入研究和思索的地方，包括著名品牌和公司的减少甚至消失；最后，吴大使感谢主办单位的盛情邀请，表示非常愿意参加问题的讨论，期待听到专家、听众和记者朋友们共同参与、积极讨论的声音。



接着，南风窗杂志社陈中社长致辞，他说，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成为了全球最快速的经济增长体，不过中国社会在转型期也出现了很多问题，下一个三十年是一个社会建设的三十年，要解决一个新新中国怎么走向世界的问题。希望举办这次论坛，通过专家们的讨论，发表各自的见解，给大家一些启发。此外，陈社长表达了在南风窗创办 25 周年的今天，希望大家和南风窗一起思考中国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



开幕式最后一位致辞的是笑笑管理咨询公司的杨晓女士，她首先感谢在场的每一位来宾，感谢已经为本次论坛努力了 127 天的筹办团队，请求大家以更为直接的明确的方式对待生活，并引征了《辞海》中关于“抱怨”的说法，号召大家勇于承担自己的责任，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为构建社会和谐而努力。

上午共有三位演讲嘉宾带来了各为 50 分钟的讲演：

第一位演讲的是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的庄礼伟教授，他演讲的题目是“中国建设性崛起”。庄教授首先指出抱怨是一种权利，中国民间的温和和激烈的抱怨声在古代社会从未停止，全球范围内正常的社会大都存在着抱怨；抱怨作为一种公民正当权利和健康的社会机制应当提倡而不应当反对；但抱怨也应当有质量有证据，庄教授



提出了民间痛苦指数和税收负担痛苦指数来具体地衡量抱怨。其次，抱怨不应成为一种性格。中国现代社会中等阶层、弱势群体和残疾人群体生活并不开心，其间均存着一定的抱怨情绪。当抱怨上升为仇恨，它将具有极强的破坏性，对个体生命和社会稳定均有伤害，常让社会和个人得不偿失。最后，要从受害者心态走向建设者心态，去追求一种建设性的崛起。具体包括发展节能型、环境友好型的经济，不尽在经济的数量和质量上达到世界前茅，更重要的是力图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原创性的贡献。

听众提出了关于如何进行精神文明建设、如何对待民间的不满和如何看待权利与性格的关系等问题，庄教授从极端民主的缺陷、正面保护和侧面引导、行动和选择等角度对上述问题做了认真而详细的回答。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高研院长邓正来教授做了题为“中国软实力建设与中国学术研究走向世界”的演讲，邓教授首先提出了两个问题“什么是大国”、“我们在讨论软实力的问题上忽视了什么”。显然成为经济大国并不是成为大国的充分条件，我们在讨论软实力的问题上恰恰忽视了承认度和学术这两个问题。其次，中国学术走向世界的背景，即中国与世界结构的关系问题，中国从世界游戏的局外人成为局中人，以主权平等的原则进入“中

心-边缘”结构中，以承认既有游戏的规则换取了对现行游戏和未来游戏规则的发言权。但真正的现实是我们发不了言，我们没法为世界提供我们的意见，原因在于我们没有对中国未来的理想图景，也没有世界未来的理想图景。不知不觉中，我们把对未来的想象力丢掉了。

尤为重要的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需要重新发现当下的中国，进而对中国的经验给出我们自己的认识。要做到这一点，意味着我们必须回答我们究竟拿什么样的学术贡献给世界学术殿堂，贡献给未来这个问题。答案包含在中国的深度研究之中，具体地说，要兑现三项使命：实现中国学术的自主性，打破西方化；实现跨学科研究，避免唯学科化；实现整体主义，打破狭隘的知识地方主义。

听众提出了政治和学术的关系、中国问题的整体性、何为真理、知识分子的独立性等等问题，邓教授的从学者的责任意识、隐藏在背后的深层次关系、批判的可能性和必然性、思想自由、生存性智慧等角度回答了提问，指出知识分子的批判性使命并不在于停留在对具体问题的合理性论证，而在于揭示出被掩盖了的深层次的具备整体性和共时性关怀的问题。

上海国际金融学院院长陆红军教授从行为学和金融学的角度指出在建设中国软实力的过程中特别要注重防止虚实力，这对于当前经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陆教授详细介绍了自己全程参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遇到的种种问题，从国家战略到运作细则，从国际学术会议到具体课题研究，特别是与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复旦大学国际金融系、同济大学经济学院与管理学院、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的合作过程与意向。陆教授的演讲还谈到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常在于其国民发现问题、定位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中国从人力资本大国如何走向人才资本的强国的问



听众就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过程中北京、上海和香港三者关系和民众不抱怨的心理对软实力建设的作用进行提问。陆教授指出在三者是一个等三角的关系模式，上海与香港需要具体事务上的合作和互补，上海和北京需要国家战略层面上的统筹。关于民众心理，一方面 90 后比起年长者对很多现象更容易接受，心理承受能力有渐强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不差钱的心态作为娱乐不错，但在社会发展层面上来看需要政府和学术界的正确引导。

下午的议程分为主题演讲和圆桌会谈两个单元，南方窗杂志社陈统奎记者主持了这两个单元：



第一位演讲嘉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教授，于教授围绕“和谐社会，走向世界”开始讲演，他首先指出中国社会的抱怨是客观存着的，剖析了社会各界对于和谐社会的责任和义务。他针对建立和谐社会重点提出了四点解决办法：其一，明确清晰的产权制度；其二，建立权威的司法机构；其三，完善高效的代议系统；其四，保障开放的媒体环境。结合本次论坛主旨，中国社会软实力的建设关键在于进一步增强人们对制度的

认同感和信心力。

听众们提出了中国儒教算不算宗教、发言和抱怨有何区别、引进西方现代制度的可能性、突发性公众事件的解决等问题，于教授指出当今知识分子重点任务在于深入研究分析当下的社会状况，进一步挖掘种种问题的深层次原因。

第二位演讲嘉宾是前驻法大使、外交学院原院长、著名外交家吴建民先生，他演讲的题目是“中国渐进融入世界”。吴大使指出 21 世纪是中国人走向世界的世纪，也是外国人走向中国的世纪，这要求我们必须走出百年耻辱造成的受害者心态，以一种新的姿态走向世界。如何行动，吴大使讲了三看法：第一，明确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和当今中国的主题；第二，悲情心理、受害者心理已经不符合时代的要求了，历史上，中国民族是自信、包容、大度的民族，事实上，这些年来，在处理国际事务的过程中，我国根据韬光养晦精神的指导日益成为世界发展上的主角；第三，充分认识“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休戚与共”这句话的深刻含义，做一个平等、理性、包容、谦逊、自信的中国人。



吴大使的演讲获到了全场观众热烈的掌声，之后，观众们就上访事件、悲情

主义、疏导爱国热情等问题向大使提问。他严谨而不乏幽默地回答了大家的提问，强调当今中华民族的最大利益在于实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三步走发展战略”，在与外部世界处好关系的基础上通过改革开放实现国家的繁荣与统一。并寄希望于当代国人特别是青年人全面、客观、深入地看待整个世界，尽量避免简单的走极端



式的非此即彼的思维,避免着急下一些笼统的跳跃式的判断,通过换位思考和理性分析,更加关注问题的复杂性和多面性,进而找到解决问题的最恰当的方案。

接下来是记者和演讲嘉宾的互动环节,吴建民大使、庄礼伟教授、于建嵘教授、邓正来教授、《东方早报》的简光洲记者环席而坐。

嘉宾们首先讨论了全天演讲涉及的主要内容,进而就媒体的作用和如何更好地对外国解释和说明国内的问题发表了各自的意见。

吴大使指出讨论的关键在于深入细致地分析为什么会有这些问题以及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并且对复旦大学寄予希望,希望复旦涌现一批人,能够把中国的事情跟外国人讲清楚讲明白,更希望复旦能出一些好的思想,使得中国社会不断进步。

邓教授指出我们并不能将问题停留在简单的喊口号的层面,解决问题不能靠煽情,而要研究问题的原因、变化、解决方案与理由。就当前的社会制度而言,我国很多的法律都是都市化的法律,对农民在农村的生活关注程度不够。

庄教授指出媒体的自我约束是必要的,不能让仇恨主宰整个世界;解释了郑和下西洋的事件,以今天的角度看,这次航海更多意义上是一场华丽的外交;重新看待梁启超、鲁迅等人提出的国民性问题,对今天中国社会而言不无裨益。

于教授更多强调了问题的复杂性,突发性事件背后往往有深层次的各种关系错综交织的原因,我们当然应该对民生中国、和谐中国立于世界寄予厚望,花更多的时间去理解中国人本身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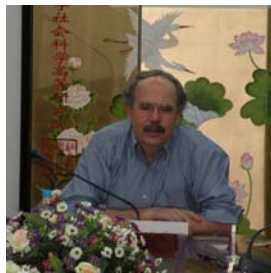
简记者指明吴大使和于教授从不同的方面解释了中国当前存着的问题,见解都很到位,他强调,如今,社会上各行各业的人都有抱怨的权利,也有不抱怨的权利,更有免于恐惧的权利。

下午5点,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本次论坛圆满结束,一些媒体的记者仍然留在现场采访嘉宾,热情的观众继续就相关问题与吴建民先生进行讨论。

七. 学术讲座

1.Fudan-UCLA社会科学暑期高级学术翻译班(第一届)开班

2009年8月3日,由复旦大学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联合举办的社会科学暑期高级学术翻译班(第一届)(以下简称“翻译班”)在复旦大学光华楼东主楼2801通业大讲堂正式开班。



翻译班从8月3日到8月21日将历时19天,由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负责实施,分为英译中和中译英两个小组,其中英译中小组有16名学员,由复旦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在读硕士、博士研究生、博士后和青年教师组成;中译英小组有12名学员,由来自美国部分大学的在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组成。所招收的学员是依照严格的学术标准,由高研院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亚洲研究中心分别组织相关专家综合依据学员的学术积累和英语水平择优录取的。



翻译班中译英课程主讲老师为著名汉学家、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东亚系胡志德教授。胡教授中文功底深厚，曾翻译过北岛、汪晖等人的著作，这次翻译班他以《社会科学文本翻译指南》（Guidelines for the Translation of Social Science Texts）为辅助教材，首先讲解了翻译的基本原则、规范和方法，接着学员们介绍了各自的学科背景、翻译历程、中译英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以及对翻译的见解体会，最后胡教授对这些问题一一做了详细的回答，同时还特别强调了翻译方法和工具的重要性。



翻译班英译中课程主讲老师为著名学者、复旦大学特聘教授、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邓正来教授。邓教授以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家小约瑟夫·奈教授的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Relevance of Theory to Practice 为底本，逐字逐句讲解翻译，并让学员分别发言、展开讨论、互相补充，帮助学员们解决在中文社会科学学术翻译中极其常见的误译、漏译和中译不确等问题，培养大家形成一种认真、平实和严谨的学风，传授给学员“由翻译而研究”这一做学问的

门径与方法，以培养我国社会科学高级学术翻译人才。

邓教授对英译中翻译的独到见解得到了学员们的高度认同，许多学员在课后就翻译涉及的文化差异、理论传统、思维方式等大问题以及译词的选取、结构的调整等问题继续向邓教授请教。



很多学员同时参加了两个课程的听讲与讨论，而且在课间休息以及下课后，中美学员们还就中英翻译当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进行了细致的较真的交流。这种认真严肃的探究方式使得现场氛围更加热烈。

主讲教授简介：

胡志德（Theodore D. Hutters），美国著名的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研究专家。1969年1月毕业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获政治学学士学位；1972、1977年，获得斯坦福大学中文硕士、中文博士学位。曾任加州大学北京研究中心主任，现为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东亚语言文化系教授、副系主任，上海大学客座教授、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特派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客座教授、南开大学客座教授。

主要著作有：《钱锺书》（波士顿：G.K. Hall 出版社，1982年；中文版，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把世界带回家：西学中用在晚清和民初中国》（夏威夷大学出版社，2005年）等，翻译过北岛、汪晖等人的著作。

邓正来，1956年2月生于上海。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Fudan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主编，《中国社会科学辑刊》（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刊）主编。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科学和知识社会学，侧重法律哲学与政治哲学的研究。

创办并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中国书评》和《西方法律哲学家研究年刊》等。主要论著有：《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研究与反思：

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自由与秩序：哈耶克社会理论的研究》、《哈耶克法律哲学研究》、《规则·秩序·无知：关于哈耶克自由主义的研究》、《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等 20 余部；主要编著有《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主编兼主译）、《国家与市民社会》（与亚历山大联合主编）等 30 余部；主要译著有《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主编兼主译）、《自由秩序原理》、《法律、立法与自由》（主译）、《法理学》和《政治学说史》等近 20 部。

2. Fudan-UCLA 社会科学暑期高级学术翻译班（第一届）结业



2009 年 8 月 20 日，由复旦大学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联合举办的社会科学暑期高级学术翻译班正式结业。本届翻译班为期 19 天，共招收中译英小组外方学员 12 人、中译英小组中方学员 16 人，课程具体事项由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负责实施。

中译英小组的主讲老师胡志德教授以每位学员翻译的不同的作品作为讨论材料，提前发给学员阅读研究，课堂上鼓励大家发言，互相指出不足，寻找更为恰当的译法。这些材料中既有《尚书》、《庄子》等传统经典，也有钱钟书等学者的作品，还有《中国不高兴》等新兴媒体作品。胡教授在译名选择、意义把握、成语翻译等方面对学员进行了指导，并基于母语的敏锐感觉剖析了汉语表达中缺失的某些环节。



英译中小组的主讲老师邓正来教授以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家小约瑟夫·奈教授的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Relevance of Theory*



to Practice 为底本，和来自不同学科的学员们逐字逐句翻译，强调了词语用法的细微差别、名词单复数的翻译技巧、上下文语境对翻译的重要作用等等。同时，邓教授指出学术翻译作为研究性翻译，是建构我们自己学术传统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在这种学术翻译过程中，我们可以切实地认识到各种问题、问题赖以成立的假设、问题提出的方式、解决问题的路径、达致结论的过程以及对结论的证真或证伪问题等。此外，邓教授特别强调了学术翻译最基本的要求是准确，对名著字斟句酌是学术研究的重要步骤。邓教授的讲解得到了中外学员们的广泛认可，现场氛围热烈，学员们积极发言、认真讨论。

本届翻译班的学员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学科，具备不同的文化背景，其中：外方学员来自美国、加拿大、越南等国家，中方学员来自复旦大学国务、社政、哲学等学院，旁听学员来自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南开大学、上海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等高校。多数学员已有出国交流和翻译出版的经验，希

望通过翻译班的学习，进一步提高学术翻译能力，了解不同文化、不同学科之间的联系与差异，为提高本国翻译水平贡献力量。

8月10日晚6:00，本届翻译班还邀请到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创始委员、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院党委副书记、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上海社科院和华东师大博士生导师童世骏教授在复旦大学光华楼东主楼2801室“通业大讲学”为学员们做了一场关于学术翻译的极具启发意义的讲座。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邓正来教授担任本次讲座的主持。

童世骏教授首先对孙周兴教授提出的当代中国学术是带有翻译性质的学术这一看法表示赞同，接着，童教授从哲学翻译的特点、难点、要点三个方面讲了多年翻译实践的心得体会。

哲学翻译作为学术翻译，首先不同于政论性质的、文学性质的和日常生活的翻译，童教授从词汇量、难度、准确性等方面将哲学翻译和三者进行了比较。其次，按照严复提出的翻译的“信、达、雅”这三条标准剖析了学术翻译，强调了信的首要性，并加入了一个“当”字，



即语境的恰当性。再次，童教授进一步论析了哲学翻译和其他学术翻译的区别，指出哲学翻译特别要重视概念的推敲、模态的辨析和学科的沟通。

哲学翻译的难点在于文本理解难、概念辨析难和哲学概念常具有极其丰富的传统：例如特定哲学家对哲学概念的特定理解，导致文本含义极具特殊性；understanding、ideas 和 civil society 的翻译；being 和 ontology 的翻译。童教授还以 Right 和 Power 翻译成权利和权力为例，强调口语上的不区分严重影响书面上的表达。

哲学翻译的要点包括：其一，对原文认真理解，把翻译的过程作为学习和研究的过程，通过翻译力求有所收获；其二，在翻译过程中避免犯看错字、看漏字等低级错误；其三，善于在阅读自己翻译作品的过程中发现不足，自查自省；其四，同一个术语在同一部作品中尽可能用同一个词翻译，保证前后一致。

中外学员们针对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文学翻译中的意境营造、“信、达、雅”的理解、译者注等问题向童教授提问。童教授认真回答了学员们的提问，并建议大家多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作品，兼顾翻译对改造民族日常语言的作用，努力提高自己的翻译水平。



大部分的中外学员均参加了两个小组的学习，学术热情极高。在中译英小组上课时，旁听的中国学员就中文里隐藏的意思，特别是古文的理解，提出了很多意见并得到了外方学员的赞同。在英译中小组上课时，旁听的外方学员常常运用



出色的语感帮助中方学员更好地理解英文原义，抓住重点，斟酌出更恰当准确的译文。

8月20日，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讲座教授、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亚洲研究中心主任王国斌教授和 Fudan-UCLA 第一届社会科学暑期高级学术翻译班的全体学员到风景优美的古镇朱家角郊游，王教授和中外学员们在旅途中就汉英互译做了轻松持久的交流。难能可贵的是，下午三点钟，学员们在郊游交流之后回到学校继续上课，讨论激烈，争辩犀利，并结合整个翻译班的课程谈了各自的感想，六点钟，在中外学员热烈的掌声中，本届翻译班正式结束，大家表达了对下一届翻译班及早开班的期待！

八. 媒体报道

1. 全球化与中国社会科学的“知识转型”

——邓正来教授在上海市“博雅讲堂”上的讲演

《解放日报》 2009-08-09 08版：思想者·连载·广告

来自：http://epaper.jfdaily.com/jfdaily/html/2009-08/09/content_243076.htm

转型的背景与使命

中国在全球化时代的处境从事实上给当下中国社会科学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即在今天这个全球化时代，我们必须对全球化的进程、走向和性质发出属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声音。

今天，我想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中国社会科学在全球化时代的“知识转型”问题。首先，我想结合全球化和中国改革实践等国际国内背景，来探讨一下中国社会科学的使命。

就全球化的国际背景而言，我所谓的“中国社会科学的知识转型”出场的具体背景主要有两个。

第一个是社会结构性背景。众所周知，中国大约是从1840年以后开始进入世界的，但是进入世界绝不等于进入世界结构中去，因为“世界”和“世界结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严格地讲，中国是在1978年以后，特别是在加入WTO等世界组织之后，才真正开始进入到“世界结构”之中去的。为此我们付出了一定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要遵守既有的世界游戏规则，但也换回来了一个资格，即我们可以对世界游戏规则本身的正当性发言，可以参与修订、废止和重建这些游戏规则。

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这个世界游戏并不像我们想象得那么简单。它是结构性的，是在世界结构中进行的。换言之，它是有“中心”和“边缘”之分的。它并不按照表面上的“主权平等”原则来运作，而是根源于一个国家的“主体性”。而一国的“主体性”在根本上依赖于该国有没有对其本身以及世界未来的“理想图景”有所认识。因为，如果你没有关于自己美好生活的理想图景，你就绝不可能修改关

于未来生活的规则——除了对别人提供的规则说 YES 或 NO 外，你不会说其他东西。

我们必须明确：有发言资格绝不等于有发言能力。从根本上来说，这不仅意味着，中国社会科学必须在这方面作出贡献，也意味着，事实上，中国社会科学已经进入到了一个以探究“中国理想图景和世界理想图景”为核心任务的新时代。

第二个出场的背景是思想背景。这个思想背景同样可以放到 1840 年以后的时间坐标上来观照。

我们知道，自中国遭遇西方以降，我们的先哲们（甚至包括在座的诸位）都开始思想。我们的先哲们在西方先发国家的外部“刺激”下思想一切，但唯独没有思想“思想的根据”。我们要么帮着我们的先哲和西方的学者们打仗，要么帮着西方的学者同中国的先哲们打仗。但是，帮着打仗的“我们”自己其实是不存在的。由于欠缺对当下中国问题本身的深度研究和理论关注，事实上，“我们”只是先哲们和西方论者们的“复印机”或“留声机”而已。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就可能丧失对中国未来的想象力，让西方的过去和现在成了我们的未来的参照系。

可见，中国在全球化时代的上述处境从事实上给当下中国社会科学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即在今天这个全球化时代，我们必须对全球化的进程、走向和性质等发出属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声音。

中国缺位的西方化倾向

在中国社会科学近 30 年来的发展中，我们基本上都是以西方社会科学的评判标准作为我们的评判标准。但是，在这种评判标准下，我们的研究成果不仅忽视了对中国本身的关注，实际上也很难与西方学界进行实质性的对话和交流。

视线再拉回国内。事实上，如今中国社会科学面临的最大的背景，就是我们刚刚经历了的这三十年成功的改革实践。在这短短的三十年内，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短短的三十年内，中国并没有遵从西方和前苏联既有的发展模式，却达到了发展的目的。尽管我们可能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们已经在世界上传统最厚重、文明最悠久、人口最多的国家初步完成了“市场化”的改革，实现了长达 30 年的高速增长。而在这些成功的发展经验中，我认为，不仅必然蕴含着中国人特有的运作模式，事实上也蕴含着中国人特有的“生存性智慧”。而所有这些，都是西方社会科学无法解释的，需要中国社会科学给出自己的洞见。但显而易见的是，迄今为止，中国社会科学对以上所述的历史性使命的认识与承担还远远不够。

在我看来，当下的中国社会科学存在着“三大困境”。首当其冲的，是我们整个社会科学的“西方化”困境。

中国社会科学近 30 年来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引进”阶段，即引进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知识、研究方法、学科体系和学术建制等等。当然，这个阶段一直在延续，未来还将延续。第二个阶段是从上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的“复制”阶段，即开始运用西方社会科学的知识和方法解释中国问题，这在经济学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个阶段也在继续。第三个阶段是从上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开始的“与国际接轨”阶段，即开始与国际社会科学的学术规范、学科体

系和学术建制等全面接轨，其主要的表现是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的学术规范化进程。

这三个阶段的共同点在于，我们基本上都是以西方社会科学的评判标准作为我们的评判标准。但是，在这种评判标准下，我们的研究成果不仅忽视了对中国本身的关注，实际上也很难与西方学界进行实质性的对话和交流。

具体一点来说，这种西方化的倾向主要表现在：首先，有相当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几乎毫无批判地将向西方舶取经验、引进理论的做法视为合理的甚或正当的。其次，由于以上这种实践的展开，迫使中国知识分子所做的有关中国发展的研究及其成果，都必须依着西方的既有概念或理论，对相关的研究成果做“语境化”或“路径化”的“裁剪”或“切割”，进而使得这些研究成果大都不得不带上西方知识示范的烙印。尽管由于中国社会科学学术传统的严重缺乏，在可预见的将来，我们还必须下足“引进”、“复制”和“与国际接轨”的功夫，但是“西方化倾向”显然只会让我们在丢失了自己之余，绝无完成上述使命的可能。

我举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众所周知，我们一直把生存权放在重要位置。但至少在目前看来，支撑这种生存权的，仍是一种“一代人的正义观”。也就是说，至少在目前，我们还常常是以我们这一代人能否生存下来作为生活正当性的基本判准。但另一方面，在如今受到愈来愈多关注的环保领域，我们有没有想过，支撑这种环保现象的是什么呢？我把它叫做“多代人的正义观”。根据这种正义观，我们这代人生活的正当与否，不能仅根据我们有饭吃、有衣穿来衡量，也就是不能仅根据我们对现时生活的认识来评判，而应当由对我们后面的一代人或者多代人的生活质量的展望和憧憬来进行评判。也就是说，在如今诸多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我们很少或者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一代人的正义观”与“多代人的正义观”这两种正义观之间所存在的紧张和冲突，更没有意识到在中国的转型过程中，我们必须就这种正义观作出政治哲学上的决断和抉择。这种对中国问题本身的深度研究和理论关注的严重忽视，我们可以统称为“中国缺位的西方化倾向”。

唯学科化与知识地方主义

如果我们把中国比作一头大象，那么，经济学就好比只解释了这头大象的大腿，法学解释的是它的肚子，哲学解释的是它的脑袋。如此一来，每个人解释的都不再是一个完整的中国，一个整体的中国不存在了。这是非常要命的现象。

中国社会科学面临的第二大困境，是“唯学科化的困境”。

什么是“唯学科化”？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国内所有大学的建制，都是根据一级学科、二级学科的方式来设置的，每个学科之间相互没有关系。但是，众所周知，高等教育刚开始设立院系建制的时候，很多学科和研究内容的“边界”是分不清的。当然，学科化的发展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它有个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与中国特殊的知识生产、知识传承方式紧密相关。

中国的知识分子既是知识的传播者，同时也是知识的生产者，我们在传承知识的同时也研究问题。但是，我们却没有认识到，知识传承和对知识本身进行研究是不一样的，传承性的知识和认识社会、解释社会的知识也是不同的。的确，在传授知识的过程当中，我们确实需要学科化，这主要也是出于知识传授的便利

和传承的考虑。但是，在我们分析和研究问题时，在我们认识和思考问题时，我们根本就不可能说这个问题的左边是法学的、右边是经济学的、顶上是哲学的。

为什么我们现在大学里的学生都在埋怨：我们在学校里从课本上背下来的东西考试可以得高分，但是到了外面却用不上？对于认识社会、解释社会和改造社会没有太大的帮助？事实上，包括我们这样一批致力于知识传播的人，当我们用自己学科化的知识去解释中国的时候，也会发现，整体性的中国被学科化的方式给肢解了。如果我们把中国比作一头大象，那么，经济学就好比只解释了这头大象的大腿，法学解释的是它的肚子，哲学解释的是它的脑袋。如此一来，每个人解释的都不再是一个完整的中国，一个整体的中国不存在了。这是非常要命的现象。

我想以中国非常突出的农民工问题为例，来说明这一问题。我们知道，今天在中国，有将近一亿八千万农民工在都市里谋生活。劳动密集型行业、都市里的服务行业主要就是靠他们。对这样一个群体，我们每年都会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让这批人在年关的时候全数得到他们的血汗钱，高高兴兴地回到家里和家人团聚，过一个好年。而每到这个时候，我们的政府很忙，我们的学者也很忙。比如，我们法学界就有学者写文章，研究讨论如何兑现农民工的权利。政治学界会关注“如何保障农民工的权利”。包括经济学、社会学等等学科，都在分析这个问题。在分析这个问题的过程中，通常大家都会同意这样一个观点——权利一定要兑现。我也从来不反对认真地、努力地、有效地保护农民工的权利，但回过头来再看一下，我们所应关注的就是那么简单的问题吗？

根本不是。我们至少要问一下，这一亿八千万农民，是什么样的农民？如果说，这大概是一批年龄从十三四岁到四十岁之间的农民，这又意味着什么？我想，这意味着，他们是中国农村的主力。什么叫中国农村的主力？严格地讲，他们其实就是承载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力。我一直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和延续，不是在中国的都市里，也不是在高等学府里，而是在乡村。那么，既然他们是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力，一旦他们都被抽空了，被抽离到中国的都市里来，这又意味着什么呢？这背后更深刻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农村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也可能就此被抽空了。而在此背后更深远的，则是一个关涉到我们中国未来发展战略的大问题。当我们循着以上脉络不断问深一步，我们再想想，这难道仅仅是一个农民工权利的问题吗？

而如今的现状往往是，我们法学界写了些呼吁保障农民工权利的文章，任务就完成了；我们的社会学也是，调查一下，什么人的权利得不到保障，什么问题需要解决，问题也完成了。但再进一步的、这背后的文化问题、传承问题、中国整个发展战略的问题，很难再有人进行深入的探索、求解。而最主要的，倒不是我们的学者不关心这些问题，而是我们的知识生产结构决定了，他们根本看不到、甚至意识不到类似问题的存在。在我看来，这就是“唯学科化”导致的结果。西方也有学科化，但问题是，人家背后有一套东西，他们知道，知识生产和传承是不一样的。

中国社会科学的第三大困境，是与全球化背道而驰的“狭隘的知识地方主义”。

吉登斯、贝克等社会理论家提出的“风险理论”告诉我们，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从事实上打破了科学主义的因果律，使得“非意图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

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这意味着，社会事件后果的“不确定性”已成为全球化时代的一大特征。这也意味着，我们必须把社会事件纳入到全球化的视野中考量。

比如说，在这几年一些重大的环境污染事件、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为什么我们的政府信息公开机制必须马上投入运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相关的政府部门都必须立即启动科学、完备的应急预案？那就是因为，在这样一个全球化时代，在那些危机突发的时刻，谁都不知道它会导致怎样的结果。如果在这时候，没有一个权威、有效的公共信息发布机制，各种不实或者尚未核实的消息就会烽烟四起，这就是所谓“社会理性”而不是“技术理性”在起作用。这也正是吉登斯、贝克所讲的“风险社会”试图揭示给世人的一种逻辑。对于诸如此类具有全球借鉴意义的理论成果，我们应当批判性地拿来、学习、再探索。然而，中国社会科学却存在着较为普遍的“狭隘的知识地方主义”。我们很多研究只关注中国，甚至仅仅是某个省、某个地区的问题。这种非常缺乏全球化视野的现状亟待改善。

转型何以可能

在“走向世界”这一新的历史阶段，中国社会科学必须建立“立足中国”的学术判准，并以此为据展开对中国问题和一般理论问题的深度研究，进而用西方社会科学界能够理解的话语形式，同它们展开实质性的对话，最终达到交流和影响的目的。

基于上述认识，我认为，中国社会科学的“知识转型”至少要完成三个主要任务：一要突破“西方化倾向”，确立中国社会科学相对于西方文化的自主性；二要突破“唯学科化倾向”，确立交叉学科甚或“无学科”的研究方法；三要打破狭隘的知识地方主义，走向知识的全球化。在此，我想特别强调两个密切相关的问题。

第一，我们如何对中国、尤其是当下中国进行深入的理论探究。这就要求我们不能以唯学科化的方式、西方化的方式、意识形态化的方式研究中国，而一定要重新去发现中国。

这里的“中国”，绝不是1978年以前或更为久远的中国，而是和它有着历史性关联的世界结构中的当下中国。这里的“中国”也不只是地理或人口意义上的中国，不只是经济意义上的中国，而是体现着中国人文化身份和政治认同的中国。这里所讲的“中国”，不是意识形态视野中的中国，也不是中国传统知识视野下的中国，更不是西方知识视野下的中国，而是有待我们运用各种理论资源予以认知并建构的一个伦理性的文明体。

但是，如何做中国的深度研究是非常困难的。我认为，我们在认识这样一个中国的时候，必须获得一种“知识上的转型”或者“知识上的解放”。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从既有的那套在学术旨趣上西方化、在研究方法上唯学科化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中解放出来。

第二个问题是，中国社会科学如何“走向世界”。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我们对全球化的认识不断深入，对“全球化同样给中国社会科学带来发展机遇”的认识不断深入，中国社会科学界不失时机地提出了让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的战略。我想，这一战略的提出，预示着中国社会科学有可能逐步走出“引进”、“复制”和“与世界接轨”的历史阶段，迈入“走向世界”的新时期。在我看来，“走向世界”这一新的历史阶段，绝不仅仅是此前三个阶段

的自然延续，而是从根本上为中国社会科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中国社会科学在此一阶段必须建立“立足中国”的学术判准，并以此为据展开对中国问题和一般理论问题的深度研究，进而用西方社会科学界能够理解的话语形式，同它们展开实质性的对话，最终达到交流和影响的目的。

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的问题，我个人一直坚持这样一种观点：“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意味着，我们需要用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社会科学作品走向世界，而不可能用“西方化”的社会科学作品走向世界。这不仅因为，“西方化”的社会科学在很大程度上并不能解释中国社会发展的深层问题；还因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在很多方面是以中国的文化为支撑的，因而也就注定要涉及到社会科学的“地方性”问题。这就需要中国的学者，用一种超越狭隘的“地方性”的社会科学，来解释和回答中国社会的发展问题。就中国社会科学而言，我们至少可以拿出两方面的成果走向世界。一是基于中国立场拿出我们对全球化进程和世界秩序的性质、走向的重构与理解；二是让牢牢扎根于当下中国的深度研究走向世界。（本报有删节）